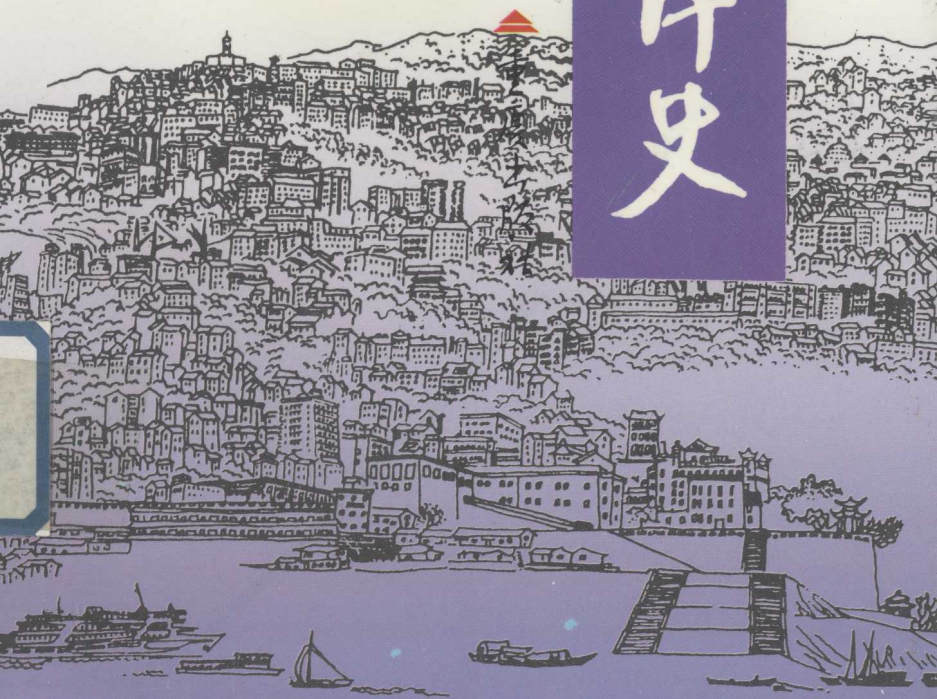


重庆开埠史

● 隗瀛涛 周勇 著



K297.19

17

重 庆 开 埠 史

隗瀛涛 周 勇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吴立平
封面题字:徐文彬
封面设计:吴庆渝
技术设计:聂丹英

隗瀛涛 周 勇著

重庆开埠史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大足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65 千
1983 年 2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7-5366-3684-9/K·191
定价:9.30 元

而又点由陈独秀为重庆，胡适为文的主张，陈独秀等宗陈独秀事。
。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
。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胡适等主张。

前言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地居四川盆地东南。它借长江及其支流之便，沟通了四川盆地内部，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自古以来，重庆就是四川东部地区的商业重镇。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从19世纪末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各省区的基地。

早在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以前，整个四川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冲击，但就社会经济而论，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使英国取得了侵略西南的法律依据。1891年重庆开埠则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到了中国的西南腹地。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本逞其淫威，给中国加上了《马关条约》这条空前屈辱的锁链，气势汹汹地与英国角逐。美、法等国侵略势力也争先恐后伸入。重庆开埠以后，以英国为带头羊，日、美、法各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租界，强索租借地，和清朝四川政府沆瀣一气，与人民为敌，又辅之以军舰入侵的军

事威胁和宗教传播为主的文化侵略,以重庆为枢纽由点及面辐射渗透,把四川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与穷凶极恶的政治军事侵略并举的是猖獗的经济侵略。重庆开埠以后,洋货入川如决堤之水,不可遏止。经重庆浸及穷乡僻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四川的自然经济基础。经济侵略的另一手,则是掠夺四川矿产资源,川江航权,开设工厂、公司及洋行。帝国主义以重庆为基地,把四川市场以及与四川相联系的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的部份市场也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渐加深。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

重庆人民有光荣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传统。自1863年第一次重庆教案以来,农民和城市人民的斗争连续不断。重庆开埠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清王朝的腐朽和卖国,尤其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针对中外反动统治者的合流,重庆人民最早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以新的姿态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战,推动了整个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酝酿了辛亥革命的高潮。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化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①帝国主义对重庆的侵略,促使民族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72页。

资产阶级发生发展。以“森昌字号”开办为标志，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首先在重庆产生。经过 20 年的发展，重庆在火柴、纺织、玻璃、航运、电灯、制造、矿业等行业中建立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成为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资产阶级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除具有全国的一些共同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

(一)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重庆开埠的同时，比沿海省区约晚 20 年，它主要是在“振兴商务”、“挽回利权”的口号下，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产生的。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开始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形成影响全国的政治思潮。因此，当洋货呼啸而来之时，重庆的工商业者就可以立即拿起民族主义这个武器去回击帝国主义。

(二)重庆民族资产阶级是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当时这个队伍以中小资本家为主体，与帝国主义比较疏远。这个阶级尽管力量弱小，但从戊戌时期登上重庆政治舞台开始，他们的斗争便有一定声势。

(三)重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封建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较有反帝勇气，他们领导的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显示了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中，由于革命派占了优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站在革命一边，接受革命派的领

导,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赞助革命。

(四)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革命派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经过长期的准备,掌握了武装力量,并且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起义,趁全国革命高涨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革命力量迫使重庆的清朝官吏缴械、投降,建立了“蜀军政府”。“蜀军政府”是四川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推动了川东各州县的起义,而且促进了成都独立,壮大了全国的革命声势。尽管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不到半年,但是它在结束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传播民主主义思想方面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辛亥革命在重庆的失败留下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教训,从而启迪了进步人士为拯救中华而进行新的探索。新陈代谢的历史辩证法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的面貌随即为之一新。

重庆开埠的历史不仅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课题。我们的祖国疆域辽阔,由于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也就显示出了地区的差别性。只有深刻地认识这种差别性,一部中国近代史才能丰富多采地、准确地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写作《重庆开埠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重庆开埠的历史回顾,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这方面的参考材料。

本书分五章：从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从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的重庆政治史和经济史。由于有关资料史料相当分散，不易收集，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重庆市政协历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出版社、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同志们的大力帮助，谨致谢意。

隗瀛涛 周 勇

1982 年 4 月于四川大学

再版前言

对于重庆来说，1997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重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个时候，重庆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庆开埠史》，使我想起了很多。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于16年前。那时，我还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至今还记得1981年12月那个寒冷但却终身难忘的晚上，我坐在四川大学临江馆一间僻静的教室开笔的情景。

可以说，这本书的产生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改革发展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与我们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是我有幸在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在学术研究方面起步的第一个记录，也是我与隗涛瀛教授的第一次合作。

我只读过五年小学，半年中学，15岁的时候便提前“享受”了“老三届”的“待遇”，有了“工农兵”的经历：先是

到“酉秀黔彭”走了一遭，后来又上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再后来又有幸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10多年的动荡不堪回首……。但就我个人而言，却又有幸搭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于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那时，历史科学刚刚从“阶级斗争”中走出来，正在经历着拨乱反正的洗礼，酝酿着新的突破。作为学生的我，也在思考着如何渡过这锦江河畔，望江楼边的四年，如何能够不负时代，有所作为。当时刘大年先生有一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他提出，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我不认识刘大年先生，但崇敬先生的学识。先生的这个观点对我选择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在校读书期间的研究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年级的时候，胡昭曦先生教我们的隋唐两宋史。早在50年代胡先生读大学时，也曾研究过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为此还写过一篇论文。但因毕业后专攻中国古代史，因此，他非常希望我能继续研究这个课题。所以，我就在胡先生的指导下继续着他20多年前的研究课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认为，重庆开埠是四川和重庆近代历史的起点。但是，恰恰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文献资料的记载却让人莫衷一是。比如：重庆开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到底是1876年的《烟台条约》，还是1894年的《马关条约》？重庆开埠的标志是什么，到底是条约的签订日期，或是其他什么事件？还有重庆开埠与近代重庆，以至四川、西

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评价？等等，等等。因此，我越发感到，要取得四川近代经济史研究突破性进展，搞清楚重庆开埠是一个关键。因此，便专攻“重庆开埠”问题。为此，胡先生又把我推荐给了以研究四川近代史，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史而著名的隗瀛涛先生，由他来作我的导师，继续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到了大学三年级，按照学校的规定，要做一篇学年论文。由于我对重庆开埠已作了大约一年的研究，多少有了一些体会，便在隗先生的指导下，选了《论重庆开埠》这个题目。

当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既无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又无经过整理的资料得以参考，面对的只是零星的资料文献和散乱的断简残章。这一时期，我几乎跑遍了重庆和成都的主要图书馆，拜访了张秀熟、汤象龙等学界前辈，请教了不少老人，做了好几千张卡片。起初只打算写一篇几千字的论文，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光考证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法律依据、开埠标志就写了2万字。然后再按照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封建主义统治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出现，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政党的成立与运动等方面铺陈开去，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建立蜀军政府。当时，白天上课，晚上写作，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但丝毫没有疲倦的感觉。因而得以信马由缰，洋洋洒洒，一气就是10多万言。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

想到的。隗先生看了初稿，说有点专著的味道，就鼓励我把它作为一部专著写下去，并且把他研究四川保路运动的一些成果交给我。当时我还是一名学生，连一篇正式的论文都没有发表过，至于写学术专著就更是不敢企及的了。因此，我只能把隗先生的话当作对我的鼓励。

真正使这部文稿成书的还是我们城市命运的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个历史的大潮中，为了正确认识重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更好地发挥重庆这个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1982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和重庆市经济学会联合召开了“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讨论会”。会议组织者约请我的父亲周永林撰写了《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演进》一文，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同年6月5日，《重庆日报》全文刊载。

在协助父亲整理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后，社会科学应该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我们的城市急切地呼唤着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它的关注，迫切需要重新认识重庆，研究重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为社会科学，也为历史科学提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现实要求和学科发展的广阔前景，也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研究重庆的历史和现状，

从而确立重庆在未来发展中新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在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以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作为这部书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庆政治史和经济史。其间，以帝国主义对重庆的侵略为主线，以近代重庆经济的演变为中心，研究重庆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对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迁，从而揭示重庆城市发展的规律性，为重庆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确立提供理论的支撑。

这部书稿的写作得到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的大力支持。完成以后，立即被编入《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以《重庆开埠史稿》的书名内部出版。1983年，又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改为《重庆开埠史》。对于当时还比较沉寂的学术界而言，《重庆开埠史》的出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1984年，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分别举办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重庆开埠史》分别获得省、市政府颁发的三等奖。我想，这部并非十分成熟的著作能够获奖，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它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适应了重庆经济中心重新确立的历史趋势；在于它对重庆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给予了理论的支持，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对于我本人来讲，最大的收获在于得到了张秀熟、汤象龙等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隗瀛涛、胡昭曦、凌耀伦等

目 录

前 言	(1)
再版前言	(1)
第一章 重庆开埠始末	(1)
一 侵略者的野心	(1)
二 一场开埠的前哨战	(4)
三 马加理案中关于重庆开埠的交涉	(7)
四 英国强迫重庆开埠	(12)
五 日本强迫重庆开埠	(23)
第二章 帝国主义由点及面，对四川侵略的全面展开	(30)
一 领事馆的设立——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侵入	(32)
二 租界和租借地的设立——第一次在四川建立起“国中之国”	(35)
三 重庆海关	(38)
四 川江航权的丧失	(45)
五 经济侵略势力向全川渗透	(51)
六 疯狂掠夺四川矿产	(59)
七 宗教文化侵略的新阶段	(64)
八 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73)
第三章 重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	(85)
一 火柴业	(86)

二	棉纺织业	(91)
三	缫丝业	(98)
四	电灯业	(101)
五	川江航运业	(103)
六	矿业	(106)
七	玻璃业	(108)
八	制造业	(113)
九	其它	(116)
十	买办资本的发生	(117)
第四章	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重庆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120)
一	重庆人民自发斗争的新阶段	(120)
二	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	(124)
三	重庆总商会	(134)
四	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	(142)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重庆兴起,蜀军政府成立的前前后后	(149)
一	二十世纪初重庆的形势	(149)
二	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154)
三	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革命力量的积聚	(165)
四	保路运动在重庆开展	(176)
五	蜀军政府的成立,辛亥革命的失败	(184)
附 录	重庆开埠史大事记	(208)

第一章 重庆开埠始末

侵略者的野心并不景况，而然
“杀青”由业商工始国英，产景不景况……“杀青”
扩大对外贸易是近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既定国策。正如汉密尔顿爵士所说：“要是没有商业，就不会有陆军和海军。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的义务就是发展商业。……商业是‘我们的生命源泉，是我们的生存气息，没有它，英国就会成为北海中最贫困、苦恼、人口过多的一个小岛’。”^①可见，政治和军事的侵略乃是英国向外扩张的手段，而经济掠夺才是他们的目的。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以后，英国对华输出的商品总值曾经有昙花一现的增加。然而，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和鸦片的大量输入，英货进口总值很快便徘徊不前，并没有取得战前英国资产阶级所期望的效果。因此，英、法两国伙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来进一步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又取得了天津、营口、南京、汉口

^① 汉密尔顿爵士在中国协会 1891 年年会宴会上的发言，[英]伯尔考维茨(N. A. Polkovits)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第 192 页。